



周易參同契研究

◎ 马宗军 著

齊魯書社



周易參同契研究

◎ 马宗军 著

劉大鈞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周易参同契》研究 / 马宗军著. — 济南: 齐鲁书社, 2013. 10

ISBN 978 - 7 - 5333 - 2366 - 0

I. ①周… II. ①马… III. ①《周易参同契》—研究 ②道教—气功 IV. ①B234.995②R214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3)第 221626 号

《周易参同契》研究

马宗军 著

出版发行 齐鲁书社

社 址 济南市英雄山路 189 号

邮 编 250002

网 址 www.qlss.com.cn

电子邮箱 qilupress@126.com

印 刷 日照日报印务中心

开 本 880mm × 1230mm 1/32

印 张 17.25

插 页 3

字 数 417 千

版 次 2013 年 10 月第 1 版

印 次 2013 年 10 月第 1 次印刷

标准书号 ISBN 978 - 7 - 5333 - 2366 - 0

定 价 58.00 元

序 一

丁原明

东汉魏伯阳所撰《周易参同契》(以下简称《参同契》),向以“词韵皆古,奥雅难通”而使后学者感叹不已。就连朱熹这样的儒学大家,也认为这部道教经典多“难深之辞,使人难晓”。但是,《参同契》作为道教系统论述丹道文化的最早著作,其地位和价值又是非常重要的,它被道教誉为“万古丹经王”则足以证明其深远学术影响。出于对道学与《周易》的喜好,马宗军同志在考博之前就留意于《参同契》一书,考博后便把《〈周易参同契〉研究》定为博士学位论文,获得博士学位后又锲而不舍,反复修改、补充和拓展,终于匠成是书,并由齐鲁书社梓行。我作为宗军同志读博期间的指导教师,对其执著的治学精神表示钦佩,对其大作的出版表示衷心祝贺。

唐刘知古《日月玄枢篇》云:“道之所秘者,莫若还丹;还丹可验者,莫若龙虎;龙虎之所自出者,莫若《参同契》焉。”其实,《参同契》不但论证了内外丹修炼原理及鼎炉、药物、火候等技术层面的问题,而且还涉及了易学、哲学、科学和生命学诸多精深的理论问题,其中解读好“太易”、“炉火”、“黄老”三者之间的关系,可谓抓

住了研讨《参同契》的肯綮。宗军博士在自己的著作中始终以此为主线,首先认为“太易”、“炉火”、“黄老”所谓“三道由一”的“一”,既非“太易”,亦非“金丹”,更不是指三者合一抑或神仙不死之目标,而是指“生生不息之道”。指出这个“生生不息之道”,即是太极、太虚、无极。所谓“三道由一”,即指“太易”、“炉火”、“黄老”皆寓于“太极图式”之中,并由它将阴阳、八卦、鼎炉、药物、火候、月体纳甲、十二消息、六虚、六十卦气等连贯成一个统一的宇宙整体,其中“生生不息之道”既代表着宇宙发展变化的无限永恒规律,又代表着宇宙生命的最根本的精神。其次,认为《参同契》是“太极图”、“无极图”的源头,而“无极图”则来自“太极图”。如果说“太极图”将“太易”、“炉火”、“黄老”整合一体是偏重于宇宙论哲学与生命论哲学的建构,那么,其“无极图”则主要是用以说明内丹修炼的。根据陈抟将内丹修炼分为炼己筑基、炼精化气、炼气化神、炼神还虚四个阶段,“无极图”所说明的内丹修炼,实际上是体现了第一阶段的道术与后三阶段的仙术的有机统一。复次,认为内丹理论包括了“内丹三要”和“性命双修”。其中“内丹三要”是必要条件,“性命双修”是充分条件,两者缺一不可。宗军博士的这些观点,不一定面面圆融合理,也不一定能得到学界的广泛认同,但其论述却是有据有理,分析详审,不失为一家之说,在此请学界同仁批评指正。另外,他在研究方法上也尽可能地采用全面的观点、历史的观点及将考证与义理有机结合在一起,这说明马博士撰写此书始终持审慎的态度,此种学风值得提倡。

宗军博士1980年底济南大学物理学专业毕业后,响应祖国召唤,奔赴西藏江孜县,曾任政府办公室副主任。直到1995年12月,才由国家统一内调,安排在中共济南市委党校做教学工作。长期的行政工作铸造了他良好的文字水平,并由此培养了他的浓

厚哲学兴趣,于1992年考取中共中央党校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生,师从中共中央党校副校长杨春贵教授,1995年6月毕业并获哲学硕士学位。2000年又考取山东大学中国哲学博士,从事道家与道教的研究。

宗军博士为人忠厚诚实,品德端正,在读博期间勤奋好学,博览群书,持之以恒。虽然此序由我撰写,但我想在京的杨春贵教授看到此书的出版也会非常高兴。故借此机会,我愿与杨教授一起祝愿宗军同志在学术阶梯上继续攀援,以达到更高的造诣。

2011年6月

于济南如意苑

序 二

林忠军

成书于殷周之际、为史官所掌管的《周易》本为卜筮之书。其成书之时，儒道两家均未产生，故《周易》既非道家的典籍亦非儒家的典籍，但《易》文本在流传的过程中，以其独特的具有卜筮意义的阳爻和阴爻符号，对儒道两家的产生和形成发生过重要影响。脱离卜筮语境的《易》文本符号，具有普遍意义，无非一阴一阳，庄子所言“易以道阴阳”、帛书《衷》篇所言“易之义呼阴与阳”，即是此意。它作为易学解释的对象，成为早期道家和早期儒家产生和形成的源泉。先秦道家崇阴，先秦儒家尚阳，见仁见智，溯其源，皆本之《周易》文本阴阳符号。

按照史书记载，老子作过史官，古代史官掌管卜筮的书，承担卜筮之职责。《周易》有“巽在床下，用史巫纷若，吉，无咎”之辞，描述了早期史巫举行筮占活动相关的场面。《周礼》和《春秋左传》都有史官掌管和使用《周易》卜筮的记载。孔子对史巫易学作过概括：“赞而不达于数，则亓为之巫；数而不达于德，则亓为之史。”（帛书《要》篇）因此，说老子未读过《周易》，是不合情理的。更重要的是，老子许多思想与《易》文本符号相关。如老子提出了

有无、难易、长短、高下、是非、强弱、损益、刚柔、吉凶、福祸、得失、雌雄、生死等许多相反相成的概念；老子有主静、贵母、守雌的观点；老子提出“反者道之动”的著名的论断。诸如此类，举不胜举，不能说老子的这些思想与《周易》毫无关系。

而曾经问礼于老子的孔子，晚而喜《易》，“居则在席，行则在囊”，读《易》“韦编三绝”。孔子在传授、整理《周易》时，发现了《周易》中有文王之遗言；提出了“后亓（其）祝卜”、“观亓（其）德义”的易学解释方法，首次将《周易》这部卜筮之书纳入学术的视野，以儒家独特的眼光加以理解和解释，在认同《周易》原有卜筮性质的前提下，极大地促进了《周易》与儒家思想的会通，实现了话语系统的转换，改变了《易》文本的性质，把卜筮的《周易》转换为德性之书或哲学之书。以解释《周易》为宗旨的《易传》的成书，再次印证了《周易》乃是先秦儒家解释的重要文本和思想源头之一。

然而《易传》作为儒家解释《周易》文本的作品，虽然可以依据儒家的立场，重建《易》文本语境，对《易》符号做更多的解释和阐发，但绝不是脱离文本阴阳而漫无边际任意的解读。必然是从阴阳两个方面，即从内涵儒道两家意义的《易》符号出发，选择儒、道相关的概念、观点和思路，做出创造性的理解和解释。这是《易传》能够继承和整合道家的“道”、“太极”、“精气”等观念和“遁世无闷”、“寂然不动”等理论的原因。

就汉代而言，儒道两家政治上势如水火，貌似冲突激烈，不可调和。但事实上由于儒道两家学术发展的需求，在互融的同时则已以易学为中介形成互补会通的趋向。汉初道家《淮南子》承袭了《庄子》、《管子》等先秦道家传统，多次引《周易》文辞解说之，严君平的《道德经指归》诠释《老子》之作，其论述事理多引《周易》经传之义，严氏弟子扬雄模仿《周易》作《太玄》，“观太易之损

益,览老氏之倚伏”,融会黄老和《周易》。东汉魏伯阳凭借《周易》的概念、理论建立丹道学说。《易纬》借用许多道家观念、思想和理论论证宇宙起源,解说易学象数。东汉郑玄注《乾凿度》时,则系统地引进老子的自生、自彰、自通、从无入有、以无为本的思想。汉末虞翻注《周易参同契》和《老子》,并援引老子之言和《参同契》中天体纳甲说释《易》。如果说《易纬》和东汉郑玄、虞翻等人的易学著作是援道入易,那么《淮南子》、《道德经指归》、《太玄》、《周易参同契》等则是援易入道。无论是援道入易,还是援易入道,皆是儒道互相融合的结晶。在汉代儒与道或易与道会通过程中,《周易参同契》占有重要的地位,整体上体现着儒道的合流的趋势。若无《周易参同契》,不可能形成后世以解释炼丹为内容的复杂道教理论,更不可能形成宋代易学中的图书之学和儒道释兼顾的宋明理学。就道教言之,《参同契》涵盖了易学理论,是具有易学特色的道教。就易学言之,《参同契》虽然是丹道之作,其对于易学的引用和阐发,深刻地反映了道学者对于易学的独到的见解,属于道教易学。

马宗军博士在认真解读原典和综合前人已有研究成果的基础上,撰成大作《〈周易参同契〉研究》。在认可葛洪“其说如似解释《周易》其实假借爻象,以论作丹之事”的说法的同时,又接受了朱熹“此虽非为明《易》而设,然《易》中无所不有。苟其言自成一,家,可推而通,则亦无害与《易》”的观点。故从易学和炼丹两个方面入手,深入探讨《周易参同契》。就易学言之,作者按照自己的理解,以汉代象数易学为视角,对《参同契》所涉及的重大易学问题进行了详尽的辨析,系统地阐述了阴阳五行、纳甲、卦气、河洛等思想渊源、形成过程和数理内涵及其与炼丹的关系,其旨在于凸显汉代道教视域下的象数易学思想特点和思维形式。就丹道学言之,论述了外丹、内丹的形成、演变及其修炼的条件和过程,

揭示了由外丹到内丹转换的原因。进而对《周易参同契》的易学思想和丹道思想作了比较客观的、历史的评价。更为可贵的是，作者依据自己的理解，对于《周易参同契》中的一些问题提出了自己的见解。如“三道由一”之“一”为“生生不息之道”，《周易参同契》是“太极图”、“无极图”的源头，内丹理论包括三要和性命双修等观点，发人深省。虽然作者的一些观点未必得到学界的认可，其论述也未必尽如人意，但透过大作仍然可以显现出作者扎实的专业功底和为学术研究不计得失、勇于付出、执著追求的可贵精神。

马宗军先生是山东大学哲学院毕业的博士，《〈周易参同契〉研究》是其博士论文，其著作是在博士论文的基础上改写而成。今大作即将出版，让我作序，欣然接受，故略述数语而为序。

2011年5月

于山东大学

<h1>目 录</h1>	
序 一	1
序 二	1
导 论	1
一、目录学和文献学方面	5
二、外丹与科学史方面	8
三、内丹思想方面	13
第一章 《周易参同契》及其作者考略	19
一、《参同契》的作者与成书年代	20
二、《周易参同契》题解	33
三、《参同契》的思想来源	49
四、《参同契》文本与版本	86
第二章 《周易参同契》易学思想刍议	100
一、《参同契》的宇宙图式	101
二、《参同契》与“太极图”	116
三、《参同契》与“河图”、“洛书”	138
四、《参同契》与“阴阳五行”	175

五、《参同契》与汉代易学 220

第三章 《周易参同契》外丹思想蠡测 279

一、外丹演变 281

二、外丹理论基础 291

三、外丹烧炼的条件 308

四、还丹炼制的步骤 344

第四章 《周易参同契》内丹思想阐微 363

一、内丹演变 363

二、从外丹到内丹 374

三、内丹理论 384

四、“无极图”与内丹修炼 421

· 2 · 第五章 《周易参同契》历史影响钩沉 465

一、易学思想 468

二、外丹思想 483

三、内丹思想 509

主要参考文献 530

后 记 540

导 论

《周易参同契》(以下简称《参同契》)是中国文化史乃至世界文化史上的一部奇书,相传为魏伯阳所做,约成书于东汉末年。内容涉及哲学、医学、数学、物理学、化学、天文学、气象学、仿生学、历法学、音律学、养生学、气功学等领域。它将“太易”、“黄老”和“炉火”熔为一体,建立了一个博大精深的思想体系。自问世一千八百多年来,被誉为“万古丹经王”,对中国文化产生了极为深远的影响。

不仅如此,《参同契》是中国也是世界炼丹史现存最早的著作之一,通过戴维斯、吴鲁强的译介,世界多种炼丹名著(如泰勒、荷姆拉德、瑞德、莱斯特等诸家作品)、《大英百科全书》(第15版,1980年)以及《荣格全集》,均对《参同契》有相关介绍。《参同契》比现今西方留传的最早的炼丹术《圣·马克书稿》至少要早五百年,而且与《圣·马克书稿》只有孤本保存不同,《参同契》翻刻数百次,注本四十余家,现可找到注本、批校本三十四五种。《正统道藏》映、容、止、若四字号收《参同契》注八家十种,《四库全书总目》有《参同契》提要十一种,其中存目书五种,《四库全书》收注本六种。英国传教士、数学家伟烈亚力教授在由伦敦教会1867年出版的《论中国文献》中也认为《参同契》是世界现存最古的炼丹著作,《苏联大百科全书》(1950年)“炼丹术”条和化学家涅克

拉索夫《普通化学教程》对此书亦有介绍。英国著名学者李约瑟博士的《中国科学技术史》(第五卷第三分册,1976年)对《参同契》作了更为详细的介绍与深入研究。

“《参同契》之学乃参天地,同日月,契造化,赞化育,修性命,返本源的大学问,由此可以破解中国丹道的千古绝学之谜,揭示人类生命和心灵的奥秘。”^①

道教是中国土生土长的宗教,经过长期的历史发展而形成,它扎根于中华沃土之中,对中华文化的各个层面产生了深远影响。鲁迅在1918年8月20日《致许寿裳》的信中说:“前曾言中国根柢全在道教,此说近颇广行。以此读史,有多种问题可以迎刃而解。”^②在《而已集·小杂感》中又指出:“人往往憎和尚,憎尼姑,憎回教徒,憎耶教徒,而不憎道士。懂得此理者,懂得中国大半。”^③许地山《道教史》也指出:“从我国人日常生活的习惯和宗教的信仰看来,道的成分比儒的多。我们简直可以说支配中国一般人的理想与生活的乃是道教的思想;儒不过是占伦理的一小部分而已。”

道教的创始人张道陵救世济人,炼丹成仙。“道教的中心内容,主要可以炼丹概之”^④,而《参同契》被称为“万古丹经王”。因此,研究《参同契》,不仅对中国文化史、道教史,而且对易学史、科学史和生命科学史,都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参同契》一书六千余字,分上、中、下三篇及《五相类》、《鼎器歌》。内容编排上,基本以四字或五字韵文及少数长短不齐的

① 胡孚琛:《元代参同学序》,见曾传辉《元代参同学》,宗教文化出版社2004年版,第14页。

② 《鲁迅全集》第11卷,人民文学出版社1981年版,第353页。

③ 《鲁迅全集》第3卷,人民文学出版社1981年版,第532页。

④ 潘雨廷:《道教史丛论》,复旦大学出版社2011年版,第158页。

散文体和离骚体为主。其书“词韵皆古，奥雅难通”^①，假借《周易》爻象来论述炼丹之事，“所述多以寓言，借事隐显异文”^②。其真义令人不易捉摸，以致博雅如朱熹，虽然“独于《参同》拳拳焉”，“终夕不寐”，竟也感叹“眼中见得了了如此，但无下手处”。^③这是因为魏伯阳“结舌欲不语，绝道获罪诛。写情寄竹帛，恐泄天之符”（上篇）。所以他在“犹豫增叹息，俛仰缀斯愚。犹豫增叹息，俯仰辄思虑”之后，虽然明知“陶冶有法度”，也“未忍悉陈敷，枝条见扶疏”，而只能“略述其纪纲”，让“智者审思，以意参焉”。彭晓在《周易参同契分章通真义》序中，曾这样推度《参同契》作书之意：“其有假借爻象，寓此事端，不敢漏泄天机，未忍秘藏玄理，是以铺舒不已，罗缕再三，欲罢不能，遂成篇轴。盖欲指陈要道，汲引将来。”^④“《参同契》为艰深之词，使人难晓。其中有‘千周万遍’之说，欲人之熟读以得之也。大概其说以为欲明言之，恐泄天机，欲不说来，又却可惜！”^⑤无怪乎元代道士陈致虚说：“此书解者，百有余人，少能深造其奥。”^⑥因此之故，导致了种种误解。葛洪以前，很多人都以为该书是讲阴阳术数的。《旧唐书·经籍志》也把它编入五行家中，以致使它在相当长时期没有受到重视。特别是在魏晋南北朝时期，几乎看不到它对道教发展的影响。

① 朱熹：《周易参同契考异》，《朱子全书》第13册，上海古籍出版社、安徽教育出版社2002年版，第565页。

② 《道藏》第20册，文物出版社、上海书店、天津古籍出版社1988年版，第131页。

③ （宋）朱熹：《周易参同契考异》，《朱子全书》第13册，第567页。

④ 《道藏》第20册，第132页。

⑤ （宋）黎靖德编：《朱子语类》，《朱子全书》第18册，上海古籍出版社、安徽教育出版社2002年版，第3918页。

⑥ （元）陈致虚：《周易参同契分章注》，《藏外道书》第9册，巴蜀书社1992年版，第222页。

“《参同契》文章极好，盖后汉之能文者为之。其用字皆根据古书，非今人所能解，以故皆为人妄解。世间本子极多。”^①《参同契》问世后，特别是唐宋以来，注解者甚众，见仁见智，互有发挥。《参同契》一书在《旧唐书·经籍志》、《宋史·艺文志》等书籍中均有著录，南宋郑樵《通志·艺文略》独辟“参同契”一门，载注本十九部三十一卷之多，足见至少在宋代治《参同契》俨然成为中国传统文化中一门独立之学术。其实，对《参同契》一书的宗旨，早在东晋，葛洪《神仙传》就指出：“伯阳作《参同契》、《五相类》凡二卷，其说如似解释《周易》。其实假借爻象，以论作丹之意。而儒者不知神仙之事，多作阴阳注之，殊失其奥旨矣。”^②而在唐代《参同契》成为显学。唐刘知古《日月玄枢篇》云：“道之所秘者，莫若还丹；还丹可验者，莫若龙虎；龙虎之所自出者，莫若《参同契》焉。”^③宋元明清，注者多重其中之内丹术，今存者如宋储华谷、陈显微，元俞琰、陈致虚，明徐渭、陆西星、李文烛、甄淑、王文禄，清朱元育、董德宁、陶素耜、姜中真、尹太玄等人注本。此外，尚有古文派明杜一诚、王九灵、蒋一彪，清李光地、仇兆鳌、刘一明、刘吴龙等注本，皆发挥内丹之说。《参同契》并无外丹、内丹之称，后世为分别见，以其中之“炉火服食”为外丹，而称其“引内养性”之说为内丹。

迄至二十世纪的百年时间里，《参同契》作为一部历史文献，重新受到重视，很多学者对此进行了研究和考察。其研究大体体现在以下三个方面。

①（宋）朱熹：《周易参同契考异》“附言”，《朱子全书》第13册，第530页。

②（宋）张君房著，李永晟点校：《云笈七签》，中华书局2003年版，第2365~2366页。

③（宋）曾慥：《道枢》，《道藏》第20册，第736页。

一、目录学和文献学方面

疑古辨伪思想早已有之。唐刘知几《史通》中已有《疑古》、《惑经》二篇,宋欧阳修等大学者身体力行,大胆疑古辨伪。清代乾嘉学派,如阎若璩、姚际恒诸家,疑古更盛。特别晚清崔述等人不遗余力地疑古辨伪,与十九世纪末二十世纪初世界汉学界的疑古思潮汇合(如日本白鸟库吉的《尧舜禹抹杀论》和西方马伯乐的相关论点),在二十世纪二三十年代形成以顾颉刚等学者为代表的“古史辨派”。古史辨派针对传统的信古思想,在“疑古”的口号下进行了全新的释古工作。疑古思潮在“狂飙突进”的年代,无疑具有冲决罗网、解放思想的作用,它拨开几千年来的历史迷雾,厘清线索,重建古史,其功甚伟。但是过犹不及,国内外也有人将疑古辨伪推向极端,疑古过勇,对传统的古史研究带来颠覆性的冲击,影响了对中国历史的正确估计,产生了不良后果。对此流弊,冯友兰提出“释古”的口号。他说:“中国近年研究历史之趋势,依其研究之观点,可分为三个派别:(一)信古,(二)疑古,(三)释古。‘信古’一派以为凡古书上所说皆真,对之并无怀疑。‘疑古’一派,推翻信古一派对古书之信念,以为古书所载,多非可信。‘信古’一派,现仍有之,如提倡读经诸人是。‘疑古’工作,现亦方兴未艾。‘释古’一派,不如信古一派之尽信古书,亦非如疑古一派之全然推翻古代传说。以为古代传说,虽不可尽信,然吾人颇可因之以窥见古代社会一部分之真相。”^①后来李学勤又在此基础上作了发挥,从而提出了“走出疑古时代”的命题,产生了深远影响。^②这也使许多学者“走出了疑古时代”。对《参同契》研究而

· 5 ·

① 冯友兰:《中国近年研究史学之新趋势》,《三松堂小品》,北京出版社1997年版,第178页。

② 李学勤:《走出疑古时代》,长春出版社2007年版,第1页。